

人力资源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Thomas G. Rawski *

摘 要 异常丰富的人力资本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这些人力资本大多积累于 1949 年之前。1978 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人力资本的效应在其开始阶段尤其明显; 在这段时间里, 贫困的农村乡镇实现了井喷式增长, 虽然它们鲜有外部援助, 而这被视为消除绝对贫困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研究了人力资本在历史和当今的发展后, 通过重点关注海外华侨的财富积累、转型经济体的商业形成以及中国内部的区域差异, 本文利用跨国、跨区域的比较, 突出了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的不同寻常的深度。

关键词 中国增长, 人力资本, 历史遗产

一、引 言

近年来, 中国经历了继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最近且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增长。笔者认为, 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根源的理解, 不能忽视 1949 年之前积累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这一宝贵的遗产以及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几十年的其他才能, 使得相对适度的农村改革能够引发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这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如今已进入第四个十年。

笔者认为, 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与如下历史事实密不可分: 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中国普通农民就拥有不寻常的、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经济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通过发展教育以及满足中国公民“最基本的需要”, 通过农业集体化预期外的政策效果, 政府深化了这些能力。新中国的政策无疑增加了中国的人力资源储备。但是由于 20 年的集体化管制和反市场宣传, 商业才能和企业家才能似乎已经绝迹, 而它们的复兴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改革引发的农村经济繁荣的基础。本文认为, 普通农民拥有的积累于 1949 年之前几十年乃至几世纪的市场知识和组织技能的重要储备, 给予

* 匹兹堡大学经济系。通信地址: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4526 WWPH, 230 S. Bouquet St., Pittsburgh PA 15260, USA; 电话: 412-648-7062; E-mail: tgrawski@pitt.edu。本文的观点得益于与许多同事的讨论, 尤其是 Loren Brandt, Debin Ma, Pei Liu, Evelyn Rawski, James Watson 和 Rbie Watson。笔者对文章负全责, 并特别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和 Jesus Felipe, Ralph Huenemann, Jialiu Liu, Wenfang Tang 的建议。

中国独特的发展优势。

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是支撑中国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个观点有两个含义：第一，在缺少“中国式”历史优势的贫困国家中，采用中国的政策、制度安排和发展战略恐怕无法产生很好的结果。只有当笔者假设——在笔者看来是错误的——其他贫困国家的状况在本质上与改革前的中国非常相似时，讨论诸如“中国经济模式”或“北京共识”等模糊概念的可移植性才有意义。

第二，这个观点也存在历史方面的问题。就像 Frederick Harbison (1973) 几十年前主张的那样，如果笔者视“人力资源为国家财富”，如果中国长期拥有对人力资本不寻常的充裕补给，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仅仅始于1978年？

本文首先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前及改革伊始的中国农村经济。之后，笔者将考察1949年前后人力资本的发展情况。最后，通过一系列简要的比较，笔者希望强调普通中国民众拥有的人力资本非同寻常的积累。

二、一些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

一旦经济开始加速增长，经济学家便可以基本理解随之而来的动态演进。中国在1978年前后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使得农产品产出迅速增加，并大幅提高人力资本、非农劳动力、工业材料、进出口以及对未来前景的信心，而这其中的每个因素都为经济的初始增长提供了新鲜的动力。但是，改革初期温和的政策能够引发经济快速增长，其背后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解释。

中国农村改革由如下三个部分组成：大量农村合作社的迅速解散和家庭耕作的恢复；国家收购粮食价格的显著提高；农产品及其附属产品市场的部分恢复。与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强迫式、政治导向的并且不利于生产的集体经济微观管理相比，农民很愿意接受这些初始改革方案。但是新的农村经济只不过是介于集体结构和市场体制之间的中间状态，而在1949年之前，市场体制统治中国农村长达几个世纪。

尽管1978年之后的改革不够彻底，但从一些统计数据中仍能看出快速、剧烈的变化。将1978年之前的农作物最高产出同1984—1986年间的农作物平均产出做对比，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改革前后农作物产出对比

	1978年之前 的最高产出	1984—1986年的 平均产出	1984—1986年指数(1978年 之前最优产出标准化为100)
农作物产出的总价值 (1952=100)	217.4	294.0	135.2
农作物产量(百万吨)			
粮食	286.3	392.6	137.1
棉花	2.6	4.6	176.9
油类作物	5.1	14.1	276.4
糖	20.2	55.6	275.2

激励是解释产出剧增的重要因素。不再强迫农民在几十或上千户的集体经济里工作,新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认农民对于扣除税收和其他成本之后的剩余收入和产出的所有权,这个制度安排效仿了1949年之前地主一佃户每年缴纳固定租金的激励方式。此外,在公社时期,由于无法得到充分的激励,土地投资水平以及灌溉、水利设施的潜在生产力被抑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之后,这一问题才逐渐得以解决。

有研究者发现,早期新制度的引入和农业产出不同程度的增加之间存在很强并且可信的相关关系(如Lin, 1988, 1992)。但关于这种相关性的强弱,目前还没有可信的结论。回归分析对农业产出增加的解释似乎过度依赖制度因素,而没有考虑集体土地和私有土地测算上更趋于统一所带来的潜在影响(Mead, 2000),以及由于饮食水平改善带来的人力资本和生产力提高的重要作用(Rawski, 2007, 第91页)。

激励的恢复、市场的部分复苏和自公社时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收益当然足以解释大部分的增长。但是当笔者考虑伴随中国农村局部改革而来的非同寻常的巨大转变时,这些因素似乎都是不充分的。考虑如下事实:

(1) 虽然公社体系存在明显的缺点,但是改革前的农业远不是原始状态:Putterman (1993, 第14页)称,中国在1979年的大米、小麦和玉米产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和亚洲的平均水平,尽管尚低于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水平。

(2) 就像前文表1中所总结的,中国农业产出的迅速增长,很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在百分比变化率的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排除掉战争或自然灾害过后的补涨性增长)。

(3) 改革之后农业的迅速增长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资源从农业部门大规模外流。尽管播种面积下降了8.1%,但粮食产量在1978年和1984—1986年间上升了37% (《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357页),这表明在1978年和1984—1986年间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上升了45%。尽管官方数据显示农业部门劳动力存在小幅度的增加,但中国和国际研究者均发现有证据表明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迅速减少。一项研究估计在1984年和1986年投入在农耕中的平均工作日只有1979年的73.5% (Rawski and Mead, 1998)。假设农村劳动力水平在1978年和1979年没有变化,而在1978年和1984—1986年农业产出值上升了35.2%,这说明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了 $35.2/0.735$ 即47.9个百分点。

通过恢复激励机制来提高人们工作的努力程度并不能完全解释农村经济的复苏。改革释放了大量企业家才能,包括合同的签订、供应链和市场网络的出现、对官方管制的规避、贿赂及投机——这些都是在中国式“资本化道路”中真实出现过的;在中国20年农村集体化过程中,这些行为不断地通过公告、讲话、规制、文件、运动和告诫等方式受到谴责、限制以及处

罚。¹在长期中断之后,这种企业家才能的突现表明了“知识可以跨代相传”的现实,包括“实践知识,或者说‘知道如何去做’……这些(实现了)行为准则或例行程序在人群中的共享”(Mantzavinos, North and Shariq, 2004, 第77页)。

此外,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他们基本上都参与了这场引人注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国际研究者认为,在改革初期其中大部分人处于所谓的“绝对贫困”状态,这意味着,以现在的价值衡量,他们当时的人均收入或消费水平平均低于1美元。尽管官方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值为133.78元人民币,但这个数据来源的样本较小且不具代表性,因而夸大了实际收入水平。粗略的计算表明,实际平均值约为100元人民币,这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美元(Rawski, 2010, 第339页)。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主要城市以外的基准个体以及公社上报的收入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大部分中国农民属于绝对贫困。粮食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布信息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论断:在1959—1977年间,中国农村居民平均卡路里消费量持续低于世界银行的营养充足标准(Rawski, 2007, 第91页)。

发展学家认为,让人们摆脱绝对贫困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尽管对于“市场是实现增长并消灭贫困的最有效机制”达成了一定的认同,但仍有人认为“市场必须有补充……尤其在贫困持续存在的发展的最初阶段”。他们主张一种所谓“市场补充”的策略,即“在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之外,引入来自国家、市场力量以及国际援助的坚定的、联合的努力……”(Dyke, 1998, 第2页)。

但这里存在着矛盾。与中国改革最初十年削减贫困的成就相比,无论衡量标准基于数量还是比例,之前在这方面的所有成就都显得相形见绌。世界银行的分析师估计,在1980—1990年间,中国农村贫困的比例从3/4减少到不足1/3;由于早年官方数据可能存在对收入的高估,所以基于这一数据得到的结果会低估贫困削减的程度。但是这些成就发生在部分恢复的市场,尤其在健康保险和卫生保健领域,并且没有国际援助,也没有非政府机构的帮助,国家的支持也很少。从根本上说,农村的迅速发展引发了中国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对此的标准解释告诉笔者,虽然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缺少实现类似结果必不可少的主要因素,但中国仍实现了世界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贫困削减。

著名的经济史学家 Richard Easterlin (1981) 在几十年前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是全世界都在发展?”对中国1978年之后农村迅速发展的传统解释再一次引出了 Easterlin 的这个问题。如果农业生产的家户式经营、农产品较高的价格、对农村市场的适度鼓励以及对土地改良和水利管理的公共投

¹ 典型的描写还包括 Chan, Madsen and Unger (1992, 第271—282页) 和 Lyons (1994)。

² 改革前中国农村的收入和消费差别不明显,故储蓄可忽略。

资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增长,那么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贫困削减速度仍旧如此之慢?显然,很多国家拥有甚至超过这些算不上严格的条件,但是相比之下,能够真正实现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上大幅度削减贫困的国家却很少。

如何解释这一矛盾?是否是发展学家夸大了削减贫困的难度?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是研究者忽略了解释中国贫困削减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第一种情况不太可能,笔者主要关注后者。

尽管缺乏一些普遍认为的经济发展的必需条件,中国仍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哪些因素可能被笔者所忽略?Easterlin (1981)提出,正规教育的开展是新技术传播的关键因素,而后者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他列比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1950年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成人识字率(48%)远高于印度(19%)、其他低收入亚洲国家(24%)、北非(12%)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7%)。

笔者虽然认同Easterlin对人力资本的关注,却担心经济学家会因为过于注重量化研究而过多强调人力资本与入学率之间的联系。“提前教育”为美国的贫困儿童提供必要的准备,使其可以从学校教育中受益。这是因为,除非学生进入学校时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力资本,否则教育和经济潜力的相关性会减少甚至消失。

笔者试图寻找除正规教育之外的那些被忽略的因素,用以解释中国改革之后农村经济的活力,而不仅限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考虑乡镇企业(TVE)的发展(见表2):

表2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数量(百万)		乡镇企业工人数量(百万)	
	总量	工业	总量	工业
1978	1.52	0.79	28.26	17.34
1985	12.22	4.93	69.79	41.37
1990	18.50	7.22	92.65	55.72

数据来源:《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3)》,第142—143页。

这些数据显示出乡镇企业的迅速增长。笔者更关注工业,因为长期以来它一直受制于农业活动。数据显示,在1978—1985年间,超过400万企业拥有正的净利润,接下来的5年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200万。工业部门乡镇企业的就业量在1978—1985年间增加了2400万,这个数字在1985—1990年间又增加了1400万。

这些企业大多起源于原始的作坊,但其出口的快速增长表明,许多乡镇企业迅速演变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竞争力量。乡镇企业的出口采购从1986年的90亿元猛增到1988年、1990年和1992年的270亿元、490亿元和1190亿元。到1992年,乡镇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42.4%和制造业出口的53%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89)》,第174页;《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3)》,第272—274页)。显然,乡村工业为中国当今成为“世界工厂”作了很大的贡献。

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疑问。尽管一些乡镇企业获得了来自城市企业的技术支持、资金和二手设备,但经理大多是典型的当地人,并非来自于城市。这数以百万计的经理从哪里来?他们如何拥有经营工业企业的能力?又是谁在管理数以百万计的新企业?

对乡镇企业发展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管理能力的缺失。尽管绝对贫困非常普遍,但中国改革前的农村劳动力确实包括数以百万计的个人,他们拥有组织、管理和进一步扩张制造业企业的的天赋,尤其在沿海省份(在1986—1988年间,其占乡镇企业出口采购总量的85%—88%——《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3)》,第174页)。

公社时期(1958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也有类似的现象。在人们的记忆里,中国的“人民公社”是社会工程领域的一次失败的尝试,其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并使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延缓了20年。即便如此,笔者仍会好奇谁在管理超过53 000个公社(成员人数平均接近15 000人)、60万个生产大队(成员人数一般大于1 000人)以及大概400万个生产队。³大多数文献同样极少提及诸如管理和会计的问题,只是记录了针对政治周旋所带来的在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之间收入的循环,而后者增大了文档记录的难度。笔者认为,日常的文档记录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并不是严重的挑战,这些文档包括全体成人村民活动和工分的日志记录、用于决定年末粮食和现金支出的年度总量数据的搜集,以及从这些支出中扣除的粮食、现金借款的列表。

与此相比,Uma Lele发现“在俄赛俄比亚,地方层面的管理……几乎完全缺乏发展能力”,“在东非的农业项目中……(精通)简单的成本会计方法的……会计师严重短缺”,“自治项目经常从一开始就由侨民管理”,这些观察关注中国不同寻常的经营管理能力背后的深层资源的农村起源(Lele, 1975, 第127、132、171页)。

对于中国改革初期农村地区变化的简要讨论,将涉及本文的中心议题:

1. 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新中国的发展和政策导致了1978年改革之后的经济加速增长。除了这些影响之外,中国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还依赖于历史上长期积累的技巧和能力,作为人力资本的补充,这些远远超出了低收入国家所能得到的水平。

2.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本不仅超过低收入国家的通常水平,其范围也不局限于城市或商业精英,在农村社会也有着广泛的分布。

3. 关键性的资本包括组织能力——形成、经营和管理由许多人参与的活

³ 单位的数量和平均规模为1978年的水平,参见Rawski(1979,第76页)。

动的能力。

4. 这些发展的能力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集中在沿海区域。

后文将继续讨论上述问题,并基于历史、现状以及跨国比较证据论证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是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三、人力资本的发展:历史证据⁴

与其他前工业社会相比,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平民和精英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商业陷阱:这不仅源于市场里价格和通货价值的波动,还包括文件(合同、收据、缴税记录)、拥有正式或非正式规章制度的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股权。不寻常的并不是银行汇票、土地合同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存在这些商业工具,而是普通农民(包括男子和妇女)参与制定这些规则的频率;而在其他社会中,仅有政治和商业精英可以参与这些活动(例如, Cohen, 2005; Rawski, 2007)。土地交易的记录表明了这种复杂性。

所有权。清朝时期(1644—1911),土地可以被购买、出售、出租、抵押和分割。交易经常是复合的,而且经常用书面文件记录,其中许多仍保存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例如, Muramatsu, 1966; Yang Guozhen, 2009; Zhang Deyi 等, 2009)。一块区域的所有权可以被赋予相互独立的不同组织,这些组织分别拥有不同的地上或地下权利——这种所谓的“一田两主”或“一田三主”系统——而且权利可以被出售、出租或担保。佃户和地主一样,可以购买、出售、出租或抵押他们的既有权利。Long Dengao 搜集了许多这样的合同:图1概述了贵州一块林地的制度安排,这块林地有100个独立所有者,其中一些所有者只拥有少到只有1/608的份额。

到清朝中期,农田被广泛地分给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并且(尤其在南方)基于血缘关系。John L. Buck 援引资料表明,在1865年,私人拥有92.7%的土地(其余土地被皇室、贵族、学校、寺庙、军队和祠堂所拥有)。他在1929—1933年间的调查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所有地区中,私人拥有至少82.4%的土地,并且,这个比例在大多数地区都超过了90%(Buck, 1937, 第193页)。

大多数农民家庭拥有土地。Buck 的调查发现,在北方小麦产区,83%—99%的农民至少部分拥有他们耕种的土地。在南方水稻产区,租赁更为普遍,在调查中,大约46%的农民没有土地,27%—38%的农民完全拥有土地,这与小麦产区相对应65%—76%的比例形成了鲜明对比(Buck, 1937, 第193、197页)。

⁴ 这部分基于笔者与 Loren Brandt 和 Debin Ma 的合作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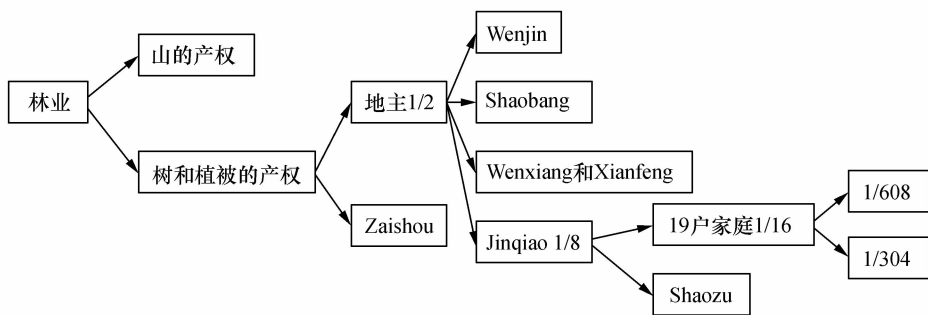


图1 贵州某林木所有权交易合同

此杉木贸易合同的出票人，Yanwan的本地人 Fan Xianzong、Xianxiu、Weiyuan、Shaopei 和 Shaozhai，他们缺乏银两并希望卖掉位于 Ranlou 的部分杉木……这些木料的所有权分为两部分：林场主拥有一部分，地主拥有另一部分；地主拥有的部分又被分成四份：Wenjin 有一份，Shaobang 有一份，Wenxiang 和 Xianfeng 共同拥有一份，Jinqiao 有一份；Jinqiao 的部分又被进一步分成两份：Shaozu 有一份，另一份由 19 个家庭共同所有。现在，这 19 个家庭将其拥有的份额卖给了 Jiang Yinghui。其成交价格为银两 10 两 1 钱 5 分。这次交易之后，这些财产将由购买者管理，出售者的兄弟及其他不相关的人无权反对。为避免未来没有凭证，本次交易的合同将被永久保存以备查看。

注：这 19 户的情况如下（包括与地主的合同）：……确实是这 19 户家庭一起出售了他们的份额。（这些家庭内部也有份额的细分。Youcai 和 Decui 分别获得一户家庭的一半。）

Ta-chung Liu 和 Kung-chia Yeh 估计，在 1933 年，79% 的中国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Liu and Yeh, 1965, 第 69 页）；在 1900 年之前，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比例无疑更高。Buck (1930, 第 231、234 页) 的调查发现，19%—20% 的耕种工作由雇佣劳动力完成，这意味着，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约 15% 的中国劳动力是被雇佣的农村工人。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大约 1/4 的中国劳动力为带薪工人，这个数字在 1900 年之前可能还要更低一些⁵，由此，笔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部分中国人是个体经营，其中大部分以完全或者部分的所有者-农民的双重身份出现。无论是所有者-农民还是佃农-农民，他们都拥有剩余所有权，一旦他们缴纳了地主的地租、税赋和其他生产成本，他们就可以拥有剩余的劳动产出。由于许多家庭制作手工艺品、行商并从事其他与市场相关的活动，远早于工业化时期，因此中国农村百姓就可以从广泛分布的基本管理技巧中受益。

商业化。清朝见证了商业化和货币化水平的上升。早期对于劳动服务和支付的安排已经相当于高级的现金社会。工资和税收的支付变成了现金交易。租金用现金或易在市场上流通的作物支付。

⁵ 由 Liu and Yeh(1965, 第 69 页), 假设雇佣劳动力包括 15% 的农村工人, 50% 的工人从事“老式的运输”, 没有工人从事手工业或做小商贩, 100% 的工人在其他部门。因此, 就业工人工资为 3 074 万元(农业部门)+2 574 万元(非农业部门)=5 650 万元, 或总就业的 26%。

部分研究者追踪了国内贸易网络深化的过程，这在海港或河港城市尤其值得注意（例如，Rawski, 1972; Marks, 1997; 吴承明, 2002）。已故的 Skinner (1964) 的一些有影响的研究发现，根据市场周期、活动规模和交易产品及服务的种类来区分市场环境中的不同内嵌阶层，这种区分从大城市直至遥远简陋的村庄中都存在。Ch'üan and Kraus (1975) 发现，在清朝，“无需为已有的水运设施增添额外的负担——甚至不需全部利用，官方水运体系便可以在数周内计划、执行并完成跨越 1 000 英里的几十万石货物的运输”⁶。英国商人希望进入他们认为非常广泛的中国国内贸易网络，这引发了 1839—1842 年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加深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中国国际贸易的控制，这种情形延续了一个世纪，直到后来太平洋战争开始才有所缓解。Linda Cooke Johnson 引用了多种对于 1842 年之前上海贸易规模很大且仍在成长中的描述，包括引用“桅杆林立”，并由此认为，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贸易量超过了伦敦 (Johnson, 1993, 第 175—176 页)。

经济史学家方行将中国农村经济描述为“农业和手工业、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双重结合”的模式 (吴承明, 2002, 第 187 页)。吴承明发现，开始于 19 世纪后半叶并延伸至 20 世纪前几十年，中国经济向商业化的长期变迁开始加速，其间，国内贸易量的估计值在 1869 年和 1904—1908 年间上升超过 80%——远高于总产出的增速。根据吴的研究，与 1840 年之前的水平相比，在 1919—1920 年进入国内贸易渠道的粮食、棉花和茶叶总量分别上升了 126%、315% 和 28% (同上, 第 278—279 页)。J. L. Buck 在 1921—1925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7 个省份的 2 866 名农民出售了其略超过一半的产出 (以价值衡量)——4 个北方省份为 43.5%，安徽、浙江、福建和江苏为 62.8%，总体为 52.6%——这大概反映了商业化水平的提高，增加部分源于由铁路、汽船和电话带来的运输和交流的便利 (Buck, 1930, 第 199 页)。

中国国内产品市场所呈现的特征符合竞争性市场的结果，尤其在商业氛围更浓的沿海和沿河地区，那里农民每天往来于家庭和当地市场之间。在这些地区，市场进入的限制很少。由于中介商频繁参与交易，拥有资源的、可信的个人不用预先积累财富便可从事商业活动。官方对人口流动没有管制，因此，商人可以自由进入有发展前景的地区经营；在各地的商人组织中，有很多来自很远地区的成员的记录，这证实了商业驻留 (何炳棣, 1966) 的重要性。中国行业协会通常寻求兼容并包，在某一行业中，只要当地商人同意缴纳会费并遵守行会规章，即可成为会员 (Burgess, 1926; Morse, 1932; Rowe, 1992; Moll-Murata, 2008)。

地方政府收集整理的粮食价格月度数据是可以获得的，这使得对粮食市

⁶ Ch'üan and Kraus (1975, 第 58—59 页)。1 石碾磨过的大米重约 185 磅 (同上, 第 98 页)，所以 30 万石相当于超过 25 000 吨。

场这一最重要的产品市场做进一步分析成为可能。数据证实,存在于清朝食品经济中的商人网络实现了大量商品价格的统一。Lillian Li 观察到,与“欧洲饥荒最严重时价格翻倍、三倍或四倍”相比,中国的粮食价格在收成下降后的增加是“适度的”(20%—70%)(Li, 2007, 第247页)。

最先收集、研究这些材料的王业键总结道,“总的来说,在市场整合方面,18世纪早期的中国与欧洲很类似”;Carol Shiue 和 Wolfgang Keller 随后的计量分析也证实了这个观察,并且显示,在工业革命前夕,扬子江下游地区价格整合的情况比欧洲大陆更好,而英格兰是当时粮食价格整合发展最好的地区(王业键,1992,第53页;Shiue and Keller, 2007)。跨地域粮食价格显著的相关性证实了 Ramon Myers 的观察的一般性,他观察到“数以千计的大米中介商和商人”操纵了主要的生产和消费地区、“大量的购买者和承运商”以及“持续的价格信息流”,“最终的大米价格是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竞争的结果”(Myers, 1980, 第94—95页)。类似的状况在其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除盐之外的其他主要产品以及金属货币市场中也很普遍,而盐市由政府垄断。

组织。个体的实践活动不是商业才能和管理才能的唯一来源。商业组织一般都具有重要的商业目标,并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尤其在南方,那里高度结构化的宗族体系控制着体系内部的经济活动。即使宗族体系不够突出,农村社会也有很多很好地扩展到家庭核心之外的组织,包括寺庙、灌溉和作物看护协会、民兵组织和其他志愿组织——经常有书面规章,有时还涉及股权。

非农户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增加了市场安排的复杂性和普通村民的商业、组织经验。寺庙和学校拥有大量土地,这可以为他们的后续经营融资。宗族是主要的经济参与者,尤其在中国南方地区,他们负责分配土地,并经营学校、市场、锭盘、桥梁、渡船和其他公共服务(以及掠夺性企业),这些都是为了积累财富和影响力。另外还成立了很多小组,其目的在于管理灌溉、防止庄稼被盗等,一般村民都可以加入这些组织以及其他一些为获得经济收益而建立的复杂机构,这使得普通村民有更多的机会从这些组织或机构中获得经验。

意识形态。中国的意识形态加强了个人和家庭的商业导向。对于祖先的敬畏使得人们更加重视长期目标,尤其是家族的延续和兴旺,并且系统地提高了个人和家庭目标群体内部的积累。中国的意识形态重视节俭,从而增进未来的收益,这也符合中国倾向于在小块土地上使用过量劳力和肥料的农耕方法,因为这样可以维持土地当前和未来的丰产。从流行的谚语中可以看出这些态度(Arkush, 1984)。

结果和影响。笔者可以从三个方面描述上述因素的影响:个人对技能获取的投资、商业领域的进入和企业家才能。

中国封建时期,农村生活的实践环境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识字率和识数率。流行文化加强了这些趋势:在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英雄形象包括学者(比如诸葛亮)、君王和侠客。Evelyn Rawski (1979)描述了家庭对教育的强烈需求,这受教育服务、书籍的价格较低影响,而这种需求使得清朝的识字率远高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按惯例,政府和农民的交流均使用书面材料,包括土地税的收缴和旨在提升公共安全的注册机制。出版业这一重要行业出版发行了大量农业手册、其他实践材料和价格低廉的流行小说(Brokaw, 2005)。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20世纪30年代,Buck开展的农村调查发现,45%的7岁以上男性和2%的女性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Rawski, 1979, 第6、18页)。

讨论这个问题,笔者不能忽略Baten *et al.* (2010)搜集的识数能力普遍存在的证据,他们“基于年龄累加(age-heaping)数据的估计发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世界最高”⁷。

由于缺少资本,有能力的穷人可以通过充当中介商从事商业活动。商人为了其有限的资本能够得以周转更快,也很愿意支付一定的佣金,以换取引介以及其他可以加速交易执行、完成的服务。这种安排增加了流动性,并扩大了企业家才能和经验在普通中国民众中的分布,例如“清朝……商业政策使得小商贩和小商人可以在销售网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Zelin, 1991, 第53—54页)。Zelin称,在手工业、制造业的生产、销售领域,劳动力分工的极化程度十分显著,这反映出资本市场多渠道融资并将其重新分配到有潜力的项目中的能力有限(Zelin, 1991, 第49—51页)。因此,对于想要成为企业家的人来说,受限来自亲戚及个人社交网络的资金的可得性,企业规模大多有限。

学徒体系一方面令普通家庭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商业活动,另一方面扩大了中国商人的等级划分。年轻人在工匠、商人或地主处做学徒,他们每天工作很久,除食宿外一般没有其他收入,但是他们从中学到了技术,这使得他们日后可以自己开店或做富人的中介商或管家。⁸

船员的情况反映出中国企业家活动不寻常的深度。Jennifer Cushman发现,作为“沿海社会最贫困的群体”,中国远洋船员没有现金收入,只有“特定的货物补助”,这意味着“中国船员首先是商人,其次才是水手”(Cushman, 1993, 第99页)。Su Jing和Luo Lun发现,沿大运河进行国内贸易的商船的水手,其情况也类似(Jing and Luo, 1978, 第59页)。与此相比,在

⁷ 年龄累加指未受过教育的人们倾向于报告约整数。在不识数的人口报告其年龄时,与29或51相比,研究者经常使用类似于30或50这样的数字。

⁸ 对于手工艺学徒,请参见Hershatter(1986,第3、4章);Ta Chen详细描写了商业学徒的情况(1939,第61—62页)。

东印度公司,只有高级船员才能得到货物(Cushman, 1993, 第105页)。

企业家才能的散化程度也反映在商品生产的广泛分布上,这点在手工业和制造业中尤其明显,这也创造了“从家户经济到最终消费者之间很长的链条,其间包括一系列的中介商和小型加工作坊……和以前一样,工厂的开张、倒闭都非常容易……许多工厂频繁变更所有权”(Zelin, 1991, 第51页)。农产品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Amano Motonosuke (1941) 研究安徽大米贸易,“大米从产地到只有一省之隔的上海,其在水运中转手超过60次”,这反映出其过程的复杂和高效。⁹

由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描写中,笔者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社会:普通百姓普遍拥有商业知识、经商经验和企业家才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之后,在私人部门(所谓“温州模式”)和公共部门(乡镇企业),小规模的生产、交易迅速发展,对此,上述知识和能力无疑都起了促进作用(Perkins *et al.*, 1977; Nolan and Dong, 1989; Byrd and Lin, 1990)。

四、人力资本的发展:当今证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力资本继续积累。近来的研究发现,中国百姓拥有的与经济相关的技能水平高得不同寻常。本节的讨论涉及以上两个方面。

教育。对于像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贫困社会来说,中国的人力资本储备无疑非常丰富,而且在1949年之后发展迅速。新中国显著增加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在中国从战争损毁恢复的过程中,尽管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但教育参与率却大幅上升,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从1952年的49.2%上升到1957年、1965年和1975年的61.7%、84.7%和95.0%(《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738页)。

在改革时期,教育发展加速。中学教育几乎普及:小学毕业生读初中的比例从1957年的44.2%猛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约2/3,并在1990年年初超过95%。¹⁰初中毕业生读高中的比例从1957年的39.8%和20世纪80年代的类似水平上升到1990年、2000年、2005年和2008年的40.6%、51.2%、69.7%和83.4%(《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721页;《中国统计年鉴(2009)》,第805页)。

过去几十年中,大学入学率上升速度惊人,本科生数量从1978年的16.5万上升到1990年的61.4万和2000年的95万,接着又上升到2005年的310万和2009年的530万(《中国统计年鉴(2009)》,第796页;《中国统计摘要

⁹ 参见 Toā keizai ronsō(1941),正如 E. Rawski(1972,第104页)所描述的。

¹⁰ 《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721页;2009,第805页)。笔者没有考虑20世纪70年代末的数据,也许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后学校重新开放的缘故,当时的数字似乎并不真实。

(2010)》,第170页)。研究生数量在2000年时刚刚超过30万,而2009年已经达到了140万,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增加了三倍(同上)。

由此,通过估计16—65岁非学生身份的成年人受学校教育情况的分布,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发生的巨大变化,如表3所示(Perkins and Rawski, 2008, 第837页)。

表3 成年人教育状况

年份	工作年龄非学生身份成年人拥有的最高文凭(%)				
	没有文凭	小学	初中	高中	本科及以上
1952	73.9	19.6	4.8	1.4	0.4
1978	39.6	33.4	20.6	5.7	0.7
2005	15.1	32.8	33.6	15.7	2.7

1952年,在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中,仅有1/4完成了小学教育,并且只有1/15拥有高于小学水平的文凭。到2005年,大多数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拥有初中或更高水平的文凭,且只有不到1/6没有文凭。虽然以上数字没有包括学校教育以外的其他教育,因而低估了教育参与的广泛程度;但随着高等教育仍在不断普及,受教育情况还将继续改善。

教育参与率的强劲、加速增长无疑反映了政府对学校教育的强调。教育产出也表明了中国尊师重教这一传统思想的巨大影响。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中国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和经济投入)。即使在简陋的农村教室中,对老师的尊重也能反映出教育在中国价值体系里的中心地位和教育工笔者肩负的责任。中国教师的行为反映出这种身份和责任的二元性。不像其他同龄人“在整个学校教育期间……缺勤率”高得惊人(Millennium, 2010, 第35页),中国教师不仅保证自己上课的出勤率,并且经常与他们的学生建立一生的联系。¹¹

“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风波迫使许多学校关闭,放弃了基于个人能力的选拔机制,却给予工人、农民、军人以及他们的子女相当的优待。有抱负的学生选择自学;此外,还有一些家庭选择采取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方式,相当于一种非正式的、老式的私塾教育。

这些应对反映了文化遗产的持续:即使经历了红卫兵大肆劫掠,基于教育水平的工资级差制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间也被废止¹²,学生及其家庭仍预期正式教育终将恢复,以及教育在长期仍有很好的社会、经济

¹¹ 几年前,笔者收到来自一位长期没有联系的中国学生的节日问候。当笔者回信表示很高兴听到以前学生的消息时,笔者马上收到了其写有“笔者一直是您的学生”的回复。

¹² 侯风云发现,在1957年、1959年和1961年,“高水平脑力工人的工资大幅减少”;“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基本被排除在1959年、1961年、1963年和1971年的工资上涨之外”;她认为1976—1990年是一段“教育零回报”的时期(侯风云,1999,第182页)。提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侯风云称,当时大学的平均工资是57元,低于餐饮业的水平(侯风云,1999,第181—185页)。

回报。选拔基于能力的高考制度的恢复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社会地位的迅速恢复,在中国重视教育的社会大背景下,1977级大学生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他们被公众称赞为天之骄子,这类似于美国社会偏好于过度称赞杰出的运动员。

由于需求超过公共设施发展的速度,私立学校兴旺发展。由于公立大学习惯性地歧视农村考生(农村学生的录取比例依惯例而定,因此很容易落榜;而城市考生即使考分较低,也可能被录取),很多农村家庭将他们的子女送到新成立的选择性较少的私立学校。当与知名省级大学合作的私立学校不能为毕业生提供与公立学校一样的文凭时,学生们开始不满。一名学生的叙述表明了这一潜在环境,“王老师说 he 来自河南一个贫困的村庄。他的父母以其积蓄供他读书,还向亲戚朋友借了很多债,他说这远远超出了他家的年收入”(Kanhan, 2006)。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收入一般的家庭依靠人际网络来给一个有前途的儿子凑钱读书。

“红色”或政治功绩能取代“专家”的想法已经从大众生活中消失。相反,在对员工的培训、遴选和提拔中,笔者反复强调对“素质”的需求。在实践中,“素质”意味着正规教育文凭,尤其大学或更高水平的教育。当前对于“素质”的强调反映了领导阶层(包括军队高层)必须拥有高学历的传统观念。对素质要求的强化引发了巨大的需求,包括在职培训、短期课程、电视大学和假文凭。在总量水平上,提高文凭的动机非常强烈:连续几次的普查结果显示,(自己上报的)受教育水平提高远超出参加学校教育的年度。

私营商业。在不利的条件下,私营商业近年来的复兴说明人们可以利用智慧摆脱逆境,这表明,中国传统在当今经济生活中有着持久的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的20年间,中国的政策消除了大部分私营商业活动。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中国城市已经类似于今天的平壤:空荡的街上几乎没有人做买卖或经营商业企业。尽管人口增多,但商店和市场的数量在减少;私营买卖要冒被批评或犯罪的风险(Liu and Zhao, 2006)。始于农村的改革逐渐放松了这些管制。一系列法律和管理新规在20世纪90年代末陆续出台,明确承认国家保护私有产权的责任,邀请私人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及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从根本上改善了私营部门的商业环境。

尽管有所改善,私营商业仍面临很多困难。时至今日,产权才(在理论上)受到国家的保护,而在当时,产权被官方所废除,并且没有相应可行的补救措施,这使得私营商业只能通过诉诸刑事诉讼来寻求非正规的保护。政府对于私人经营者的态度可以从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简称“工商管理总局”)发行的年鉴中推断出来:统计部分最先是有关行政听证会、惩罚、上诉和登记违规的数据,之后才报告了注册企业及其员工的数量等(《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

外国投资者对其运营经常要求“国民待遇”,他们抱怨地方政府歧视外国

投资者并优待当地企业。在中国,情况却刚好相反,中国民营企业寻求“国民”待遇,而外国和公共部门的竞争对手通常享有“国民”待遇。2010年5月的一项政策体现了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发布政策方针以进一步鼓励私人投资于相当广泛的关键行业,这种变化体现了让权威机构指导私人投资以实现经济持久增长”,同时也反映出私人参与某些“核心行业”一直以来的障碍。这个公告的描述令人怀疑其实际影响:有研究者称,早期的强制导向意味着鼓励私营部门是“使人不满意的”,因为“缺乏协调并几乎没有可执行的细节”,并且希望新导向“不仅仅是空话”(Ding and Yang, 2010)。

中国金融制度习惯性地歧视私营部门,使其很难得到银行贷款或进入国内股票及债券市场。银行不愿意借款给私人企业,部分因为信息缺乏,也因为担心一旦贷款未能偿还,则他们可能会被怀疑为腐败。给公共部门的贷款也可能变成坏账,但相对而言,这却不太容易吸引检查机关的注意。

在这样的环境下,私营商业的扩张非常令人惊讶。从经济改革以前的几乎为零开始,近来的数据(表4)显示,私营部门¹³正式注册的单位目前已接近4000万,占投资支出和进口的大约1/6,占纳税总额的1/7。尽管私人企业对投资、税收和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仍旧长期被排除在组织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外:私营商业获得的银行短期贷款只占银行短期贷款总量的不到4%(长期贷款的份额无疑更小)(《中国统计年鉴(2009)》,第773页)。因此,私人企业只能从人际网络和非法的私人金融实体中融资,而这些贷款的利率远高于主要银行。¹⁴

表4 中国经济中的私营、个体企业

类别	2006	2007	2008
完成固定投资的比例(%)	16.1	17.9	18.9
总出口的比例*(%)	13.8	16.0	17.0
纳税的比例(%)	14.0	13.0	13.6
短期银行贷款的比例(%)	2.71	3.06	3.37
就业年度增加值(百万)	10.3	10.0	10.0

* 出口数据只包括私营企业。

数据来源:中国网,“2008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中国私营商业最引人注目的贡献是解决了就业问题。中国拥有大量劳动力,其就业面临巨大困难。由于从事农业生产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其他正式就

¹³ 私营商业包括三类,其中两类是官方认可的企业:有八名或八名以上员工的私营企业和有七名或七名以下员工的个体企业;此外,还有非正式的一类:未注册以规避中国及其他经济体税费规定的企业。

¹⁴ 非正规金融的规模一般很大,对其的描述包括钱庄和清朝、新中国时期采用的传统商业方法。Tsai (2002)、Jiang and Ding (2004)讨论了国有银行和非正规放贷者借贷利率的差异。后者称,中国最高法院拥有对贷款合同处以四倍于商业银行类似贷款利率的权力。

业岗位发展的停滞,在2006—2008年间每年增加1000万工人的国内私营商业创造了就业——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¹⁵

普遍认为,对产权的基本保护是私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严重缺乏这一条件的环境中,中国私营部门从改革之初的几乎为零发展成巨大并充满活力的部门,为进出口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成为中国大量劳动力新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由于正式制度结构存在明显不足,这些成就突出了网络、非正规金融、企业家和官员的默契以及其他以个人信誉为私营商业增长关键支撑的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会削弱而非加强非正式制度,因此,1949年之前几十年甚至几世纪发展的有商业基础的社会结构,可能是中国改革时期私营商业活力的基础。

国际贸易。中国已经从世界最孤立的经济体之一转变为商品、资本跨国流动的**全球领导者**。现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在年进口量上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尽管大量贸易活动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但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64.8%,远远高于其他大国。¹⁶

将中国引人注目的贸易表现归因于廉价劳动力和人为压低的货币价格,虽然不是没有道理,却不能使人信服。这种论断没有注意到维持人民币在较低的、官方决定的汇率水平会增加国内出口商进口能源、材料和零部件(大部分以美元计价)的成本。低汇率也需要货币的过量发行(从国内政策视角),如果没有通过增加国内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或要求银行系统持有大量政府债券加以对冲的话,会加快国内价格和工资的上涨。这些因素削弱了假设的人民币低利率对中国出口商的好处,并减弱了人民币重新估值对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竞争力可能造成的影响。

中国出口的不再只是低档、劳动密集型并只有价格优势的产品,出口产品的迅速多元化进一步表明中国出口成就不依赖于“不平等”的贸易实践。Peter Schott (2008)、Brandt, Rawski and Sutton (2008)、Jesus Felipe *et al.* (2010)以及其他研究,记录了**中国出口产品在范围上的迅速扩展和质量方面的迅速提高**。尽管中国企业装配、出口的商品包含在其他地方生产的复杂部件的次数导致这些研究夸大了中国生产活动的复杂性,但贸易统计量和工厂调查数据证实了中国出口制造商在质量和品种方面的提升趋势。

经常占进出口总量一半以上的外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领导地位让一些研究者否认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Gilboy, 2004)。但是许多“外国”

¹⁵ 被称为“职工”的正式从业者,在2000—2008年间增加了260万或2.3%。如果去除私营企业——海外华侨或外国投资的企业以及所有者为“其他”的企业,那么,2000年的正式就业将减少860万或8.1%(《中国统计年鉴(2009)》,第123页)。

¹⁶ 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第37,724页)。这是2007年的情况;考虑到官方2008年和2009年GDP数字的真实性,笔者去掉了这两年的情况。

公司由海外华人拥有或经营；后文笔者将分析他们的商业才能在中国的起源。将中国出口增长归因于海外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本和技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海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中国（而其他国家工资较低、政治体系相对透明），也忽视了外企中的中国员工的贡献，并且假设中国缺乏企业家才能，后者使得国内企业可以利用在外企工作过的员工以及企业与外企打交道时获得的知识和经验。高铁和建筑设备领域近来的发展是中国创新能力提高的很好的实例，这从电信硬件、家用器械、汽车、货车、飞机、机械和许多其他产品的制造中也可以看出来（Anderlini and Dickie, 2010；Brandt and Thun, 2009）。

企业型政府。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共管理非常出色。清朝选拔官员的考试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实践。清政府将专家分配到治水、货币供给等需要专业人才的领域。地方官员的职业发展反映了他们在本辖区内处理治安、稳定和民生等实践问题的能力。

在改革时期，笔者发现，许多地方政府的表现类似于企业家。中国企业更大范围地参与国家间供给网络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 Naughton, 1997）。Andrew Sheng 强调地方政府“在供应链的设计和建设中的”角色，“供应链不是自发的增长……（而是）由于东亚城市发现可以利用供应链从经济特区的发展中受益，因为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关键资源……此外，减少政府干预和官僚成本，使得税收下降、通关和贸易许可改善，甚至连海关检查或强制行为也有所改进”（Sheng, 2010）。

Ke Ding 关于浙江产业集聚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活跃政府显著地依赖个人企业家的重要性。Ding（2010，第272页）发现市场的专业化促进了产业集聚；这些市场通常依赖“地方政府的主动干预”。案例研究描述了地方管理的作用，包括市场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商品分类、努力将私人经营者由从事贸易活动变为从事制造活动，这些措施关注质量控制和地方企业产品组合的升级（同上）。

企业型地方政府的特点与清朝或新中国的公共管理不同。近年来的一个现象是，地方政府职责不仅包括地方经济的维持，还包括其有质量的发展，这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相关，当时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在不依赖更多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粮食和钢铁的增产。

虽然企业型地方政府出现的时间很短，但其基本的管理方法却沿用传统方式。例如，在浙江义乌，当地工商管理总局修建了一个市场，并且，为了促进专业化，其要求摊主只能经营六类商品中的一类（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可以经营所有商品）。经营者认为此限制有损他们的利润，拒绝注册这类带有专业化色彩的商业许可证，而有此许可证才可以使用新的市场设施。地方官员解决这个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与清朝地方官员所用的策略完全相同：他们“通

过与义乌市场的主要商人进行沟通……最后,大部分摊主完成了注册……(并且)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导致产业集聚的形成”(同上,第274—275页)。

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中,GDP增长率有很高的权重,这导致了统计数据的伪造、未经认真筹划且不经济的项目的实行和其他糟糕的结果,即使如此,企业型地方政府依旧为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一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一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2008—2009年间经济下滑后能够“V形”恢复,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用他的话说,中央要求加速地方投资项目用以防止经济下滑,地方领导人就像“笼子外的老虎”一样迅速做出了反应(访谈,2009年10月)。

五、人力资本的发展:比较证据

本文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凝聚了异常丰富的同经济相关的商业、网络和组织技巧,这些资源存量要追溯到1949年之前的积累——本身是可比的。笔者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从过去继承而来的社会形态使中国可以更好地应付现代市场经济引发的各种难题。为了论证这一点,笔者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包括海外华侨、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同盟解体之后的转型经济,以及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差异。

海外华侨。中国在东南亚的移民的历史记录可以令笔者很好地比较中国村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移民的成功使其后代对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具有重要影响,这充分体现了两地民众商业才能的区别,这种商业才能使得普通中国民众能够在陌生的并且经常充满敌意的环境里成功。

已故的G. W. Skinner关于泰国的研究强调了普通中国民众的经济能力。中国移民,其中许多“几乎直接从农村来到泰国”,控制了泰国的国内、国际商业。Skinner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在“泰国体系”中,“人口稀少、土地富饶,人类很容易生存……因此节俭的价值有限,工作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中国移民来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严格的马尔萨斯设定,在那里节俭和工业是生存的基础。”意识形态增强了这种差异:中国人为了维系家族和血统传承的财富而奋斗,而泰国人的行为模式则是“更多地关注于……物质文明”。从谚语中也可以看出:对于中国人,“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对于泰国人,“做好本分的事就足够了”(Skinner, 1957, 第97、92、93、95页)。

考虑到中国人的势力在泰国已经根深蒂固,英国人在1855年迫使泰国君主准许他们“平等的商业权利和其他特权”,此特权很快拓展到“欧洲所有主要的贸易国家和美国”。1890年,“西方在此特权下自由贸易35年之后”,中国商人仍然控制着曼谷贸易的将近2/3,超过英国人控制数量的两倍。在泰国,就像在中国和日本,欧洲和美国公司的国内业务总是由“有一定财产、

受过西方教育并能代表中国民众的中国商人”所经营。中国人的优势甚至拓展到大米贸易，这也被称为是中国人“在泰国最大的战利品”，“早先的英国磨坊不是被遗弃就是转移到中国人手里”（Skinner, 1957, 第102、105页）。

泰国君主的继任者将全部外国贸易机构交给来自福建的中国商人-企业家，包括远洋船队的建设、运营以及进出口贸易的管理。自15世纪起，在商业领域，“中国人开始在泰国法庭中发挥作用”。在主导泰国国际贸易的皇室贸易中，“各个级别的工作都遍布着中国人的身影，包括皇室代理人、仓库管理人、会计师、船长、水手和海关官员”（Viraphol, 1977, 第40、19页）。类似的情况反映了中国商人的商业才能，与当地相比，他们“更善于驾驭帆船和处理经停港口的各种各样的市场状况（在那里商人多于中国人）”，也更善于“行贿和采取其他‘斡旋’手段使得经商的成本和延迟最小化”（同上，第8页）。

欧洲殖民地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在雅加达和吕宋岛，由中国人为欧洲殖民者做中介商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在雅加达发生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1974），菲律宾驱逐中国非基督教徒（1757），但是，中国人的影响仍在扩大。“雅加达政府……试图去除中国人的影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经济地位变得更为强大”（Viraphol, 1977, 第170页）。

除了东南亚，中国商人网络还遍布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太平洋沿岸。在海军准将Perry强迫日本开展对外贸易之后，在长崎的中国商人利用同官方承认的商业中心的长期紧密的关系，迅速抓住了这一商机。在1871年，有外国观察家认为，如果外国贸易公司的中国雇员“突然被开除，（在日本协议港口）的商业活动会突然停止”。20年后，外国社会非常担心“如果中日发生战争，由于中国中介商可能被扣留，则外国商业也会受到牵连”（Hoare 1977, 第26—27页）。在19世纪晚期，日韩贸易中相当大的份额——尤其是日本出口的棉纺织物——由“长崎的中国商人”经营（Furuta, 2011, 第73页）。尽管日本的区域力量在上升，日本在韩国的商业网络“与中国的竞争对手竞争激烈”（Kimura, 2011, 第53页）。

许多详尽的记载显示了在集中了组织、技术才能的贸易和移民网络中，个人的境遇如何。福建以非法贩运人口出名，这始于16世纪，近年来由众所周知的“蛇头”们经营，Ng记载，在16世纪，从中国大陆向台湾地区贩运非法移民“已经成为厦门很赚钱的职业”（Ng, 1983, 第83—84页）。

K. C. Fok描写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香港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连接着祖籍广州的海外移民和广州当地的村民。例如，Ma Zhuchao建立了一个基于私人关系的社会网络，其主要由广泛分布的移居人群所构成，其中所有人都来自广东台山的一个地方。Ma同时作为家庭和其他客户的商业中间人，兼营汇款，为新移民、银行、租赁和贸易机构服务（Fok, 2001）。

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企业家精神。关于小规模商业的形成的跨国比较发现，在前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经济中，“企业家才能出现的概率低于主

要基于市场经济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Estrin and Mickiewicz, 2009, 第26页)。

研究者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规模有限归结于一些因素,包括“(正式)制度的薄弱,如产权的执行”。尽管“20世纪90年代,转型经济中正式制度的迅速变革……改变了非正式制度”在反映“计划经济残余……(和)更重要的……形成于共产主义时期的社会态度”方面的滞后(Estrin and Mickiewicz, 2009, 第2页)。Katherine Verdery 却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空间……由底层许多规模极小的家户和顶层大量官僚且专制的组织组成……(他们,对于个体来说,导致)普遍的分化、彼此疏远……并削减了主动性和做计划的能力”(Verdery, 1991, 第433页)。

早在中国改革之前,苏联和东欧的市场经济已有所发展,包括新法律法规的出台、去私有化和官方参与商业决策的迅速减少。与中国相比,苏联的计划经济长达半个多世纪,其受共产主义影响更深,而中国似乎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共产主义在1945年之后出现的国家更可比。

这个逻辑会推出这样的预期——中国小规模私有企业的状况可能在以下两种结果之间:一种结果是前苏联的低迷经济,另一种较乐观的结果是东欧国家良好的经济绩效,后者计划经济持续的时间类似于中国,但向市场经济转型却更为彻底。

基于世界银行的数据,前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中每千人拥有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数量如图2所示,由此可以核实上述预期的准确性。尽管这些数据的误差幅度可能很大¹⁷,但笔者依旧可以推断,在世界银行的统计中,与其他转型经济相比,中国人均企业数量处于怎样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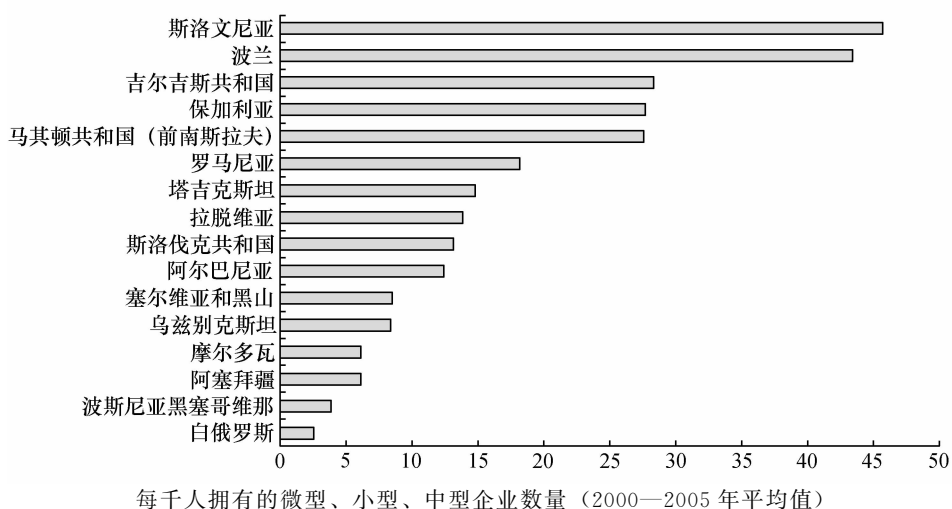


图2 欧洲的企业数据

¹⁷ 图2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由Estrin和Mickiewicz编制(Estrin and Mickiewicz, 2010, 图1)。基础数据中,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差距之大令人无法相信。

图2为2000—2005年间许多转型经济中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的年平均价值。这里去除了非常高(在2003年,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捷克共和国大概为87,匈牙利大概为55——参见Leon,2007)和非常低(在2005年,俄国、爱沙尼亚、克罗地亚、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均报告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不超过0.05)的国家。¹⁸

中国的可比数据参见表5,包括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的企业官方统计数量,以及用于修正官方数据中明显偏误的估计量。¹⁹

表5 私营、个体企业的注册总量和估计总量:1999—2008年

年份	注册的私营企业			注册的个体企业			注册企业总量		
	城市	农村	全国	城市	农村	全国	城市	农村	全国
1999	893 989	614 868	1 508 857	12 539 223	19 061 392	31 600 615	13 433 212	19 676 260	33 109 472
2000	1 079 231	682 538	1 761 769	11 251 243	14 462 375	25 713 618	12 330 474	15 144 913	27 475 387
2001	1 291 200	737 300	2 028 500	11 285 600	13 044 400	24 330 000	12 576 800	13 781 700	26 358 500
2002	1 548 444	886 838	2 435 282	11 621 997	12 152 855	23 774 852	13 170 441	13 039 693	26 210 134
2003	805 139	2 200 385	3 005 524	12 389 775	11 142 072	23 531 847	13 194 914	13 342 457	26 537 371
2004	2 387 701	1 262 969	3 650 670	13 264 451	10 240 460	23 504 911	15 652 152	11 503 429	27 155 581
2005	2 800 068	1 500 848	4 300 916	14 293 749	10 345 185	24 638 934	17 093 817	11 846 033	28 939 850
2006	3 300 349	1 680 425	4 980 774	15 620 189	10 335 877	25 956 066	18 920 538	12 016 302	30 936 840
2007	3 798 607	1 714 513	5 513 120	16 840 448	10 574 850	27 415 298	20 639 055	12 289 363	32 928 418
2008	4 550 600	208 400	6 572 000	18 586 700	10 586 600	29 173 300	23 137 300	10 795 000	35 745 300
	官方人口总量(百万)			注册、修正的每千人私营、个体企业数量					
	城市	农村	全国	城市	农村		全国		
					注册	修正	注册	修正	
1999	437.5	820.4	1 257.9	30.7	24.0	119.4	26.3	88.6	
2000	459.1	808.3	1 267.4	26.9	18.7	93.3	21.7	69.2	
2001	480.6	795.7	1 276.3	26.2	17.3	86.2	20.7	63.6	
2002	502.1	782.4	1 284.5	26.2	16.7	83.0	20.4	60.8	
2003	523.8	768.5	1 292.3	25.2	17.4	86.4	20.5	61.6	
2004	542.8	757.1	1 299.9	28.8	15.2	75.6	20.9	56.1	
2005	562.1	745.5	1 307.6	30.4	15.9	79.1	22.1	58.2	
2006	577.1	737.4	1 314.5	32.8	16.3	81.1	23.5	59.9	
2007	593.8	727.5	1 321.3	34.8	16.9	84.1	24.9	61.9	
2008	606.7	721.3	1 328.0	38.1	15.0	74.5	26.9	57.9	
2000—2005年平均值				27.3	16.9	83.9	21.0	61.6	

¹⁸ 参见网页: http://www.nationsmaster.com/graph/eco_mic_sma_and_med_ent_num_percap-medium-enterprises-number-per-capita, 2010年9月13日。

¹⁹ 表5数据来源: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除2001年、2008年以外,注册企业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这两年的数据来自《私营企业发展的基本情况(2009)》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基本情况(2009)》。

中国官方数据包括以下两类企业的信息：有八名或多于八名员工的私营企业，以及有七名或七名以下员工的个体企业。²⁰如果笔者只关注在工商管理总局注册的私营、个体企业的官方总量数据，可以看出，2000—2005年，在国家层面，每千人拥有21.0家企业，每千名城市居民拥有27.3家城市企业，这似乎证实了前文提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持续时间和企业形成之间可能的相关关系。由表2中的工商管理总局数据可以看出，与一些在1945年之前开展市场经济的东欧经济（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相比，中国的小企业并不普遍；但与社会主义历史更长的社会（俄国、乌克兰等）相比，中国的小企业更为普遍。

但是，受一些因素影响，工商管理总局注册数据似乎低估了中国小规模商业活动的活跃程度，下面笔者将按照重要性对其做回顾。

这些数据严重低估了农村企业的数量。中国的数据（肯定）和其他国家的数据（很有可能）不包括属于“企业”的家庭农场，即使农耕包括与非农企业一样的活动（商业线的选择、生产的组织、投资、营销、原料的购买、记录、现金管理、与政府机构互动）并承担相同的风险（资产损失、破产）。2007年，在中国注册的私营或个体企业中，只有1.04%涉及农业、林业、畜牧业或渔业，并且其中超过1/4位于城市或城镇，因此，从事这些活动的农村企业只占工商管理总局数据总量的0.75%（《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2008）》，第703页）。由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农业人口的规模远大于其他国家，如俄国、波兰、匈牙利等，笔者可以推断，对于农村商业覆盖量的正向修正会大大提高中国在图2中的相对位置。²¹

小规模商业的经营者经常试图规避由列举和注册带来的税费债务。以下因素可能增加了中国低估小规模商业活动的程度：

- 涌向城市的大量移民创造了大量且高流动性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工作和住所经常改变，这可能会加剧数据的低估，因为（小商贩等的）主动躲避以及职能部门在鉴定和注册微观商业大量流动人口方面的能力有限。

- 1998年的企业重组将地方工商管理总局的任命权和融资权移交给省级政府。这次改革同时解除了地方政府对地方工商管理总局的监管权并削减了对他们的拨款，使得这些地方机关只有不足以负担其开支的资金，虽然其中的许多部门仍是省级政府的一部分。这项垂直改革预期外的结果是，地方机关工

²⁰ 中国的数据包括各类大企业的细致统计，其他国家并没有这些数据。由于大型私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占比极小，这个问题不会影响后文的讨论。

²¹ 中国官方2005年的数据显示，64%的中国工人生活在农村，并且农村工人中有61.3%从事农业部门工作（Cai *et al.*, 2008, 第168, 190页），这说明农业工人占工人总数的39.2%。尽管这个数字非常大，真实的数字无疑也大于世界银行关于波兰（18%）、俄罗斯（12.3%）、匈牙利（6.9%）和捷克共和国（4.8%）2005年男性在农业部门就业情况的估计，参见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AGR.EMPL.MA.ZS>。

作热情下降,以及他们向“以多收费为主要目标的机构”转化(Liu and Zhao, 2006)。以上两点可能减少了注册企业的数量:前者减少了官方对企业全面信息的获取,后者增加了小企业对税费的规避。

• 一些地方政府可能缺乏获知小企业准确数量的能力(或意愿)。中国研究者将1999年、2000年间(见表5)报告的企业数量的大幅减少归因于记录的普遍清除。随后的数字包括不太可能的进入,比如,河北省和吉林省个体企业的数量减少了46.1%和34.4%(Liu and Zhao, 2006)。

• 为了促进城市发展并限制城市贫民区的增长,中国市级政府做了极大的努力,这一政策消除了小商业的合法聚集地并可能使其被迫进入“地下”经济。

在以上问题中,目前,只有农村商业的低估可能可以被修正。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RCRE)管理一项农村家庭的年度调查,其收集关于收入和支出的详细信息。²²1999年的数据覆盖6971个家户共28999人。²³家户调查中,“家庭经营收入”部分包括11403个条目,其中3462条与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零售业或其他(非初级)活动中的“自营企业收益”有关。此外,数据包括7941个关于种植业、渔业、畜牧业或林业中“家庭经营收入”的条目。

RCRE的这些数据意味着,在1999年,每千人平均拥有393.2家企业,其中273.8家为初级部门,119.4家与制造业或服务行业相关。²⁴

表5的下半部分用1999年中国农村每千人拥有119.4个企业替换了工商管理总局注册的农村企业总数,并且用工商管理总局的每千人拥有的农村企业数量年百分比变化率对中国农村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做了修正。²⁵这个调整没有试图修正农村初级部门商业明显的瞒报以及农村个体企业表现出的不太可能的下滑趋势,而工商管理总局数据在1999—2008年间令人怀疑地下降了55%。即使如此,表5底部右栏的每千人企业数量的修正后的数据,虽然很可能仍存在严重的低估,却优于除捷克共和国之外的前苏联经济的所有可得数据。

笔者的结论如下,与预期相反,部分修正的结果显示,中国在小规模商业的创造方面接近后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水平。与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正式制度对私人企业的保护更少,因此,对中国私营商业的强劲增长的解释,不能忽略非正式制度,在困难的制度环境中,正是非正式制度促

²² 很多研究者使用这个数据。Benjamin、Brandt和Giles描述了这个调查(Benjamin *et al.*, 2006, 章节4.0),变量列表参见<http://www.msu.edu/~gilesj/RCREHouseholdVariables.pdf>。

²³ 非常感谢Jialu Liu提供这些数据。

²⁴ 从总人口中去掉移民,则此数字将上升2%。如果家庭在某一部门(如零售业)独立经营跨国企业,则存在可能的(很小的)低估。

²⁵ 例如,用官方的农村每千人拥有企业的数量的变化修正1999年的数字,再利用这个数字修正2000年的数字。

进并支撑了私营商业的发展。

Estrin 和 Mickiewicz 认为,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削减了信任和其他非正式制度,而正是它们支撑着企业家精神和私营商业。他们称,“计划经济时期被严重破坏的普遍信任”,在前苏联和东欧转型经济中“恢复缓慢”。虽然这些研究者注意到前苏联及东欧国家转型后,计划经济仍持续抑制了企业家精神20年这一不利结果,但是,依旧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却始终是“普遍信任”情况最好的国家之一。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五次调查(2005—2008)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52.3%)中国被调查者称“大部分人可以相信”,这是全球水平24.6%的两倍多。²⁶中国的数据是前东盟国家居民平均水平(20.9%,见Lolle and Torpe, 2010,表1)的两倍多,而前东盟国家处于“低信任陷阱,那里社会资本的缺乏与信任的缺乏相互影响,这进一步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和福利”(Growiec and Growiec, 2010)。Lolle 和 Torpe 认为中国人属于“特别信任人”(2010,第15页),因为他们倾向于不相信新认识的人、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和外国人,但是这种保守的性格特点让中国人有更大的空间建立商业网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企业家才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中国的商业才能表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商业才能集中在控制国内尤其是国际贸易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沿海地区。

国际贸易和商业经验的相关关系普遍存在。例如,关于福建的情况,Chin-keong Ng 写道:

在16世纪以前,贸易主要由城市居民参与并且被少数商人垄断。在1500年前后,有地方志记载,内陆地区……仍然‘不熟悉商业活动’,那里的人们‘只重视……农业’……在16世纪中叶之后,贸易活动不再限于沿海大城市……更多的当地人参与贸易,同时数以万计的福建南部农民探寻其海外贸易的新方式。在1600年前后,估计认为,福建人中有一半在家乡之外谋生(Ng, 1983,第12页)。

中国南方沿海和内陆居民商业才能的差距,早在1500年就已经被注意到,现在也表现得很明显——这反映了文化特征和组织知识的传承。尽管政府努力增加内陆地区包括商品和投资资金在内的跨国流动份额,沿海省份仍保持着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势(见《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17-12、17-19),除此之外,一些例子可以说明目前中国商业才能深度、持续性的区域差异。

²⁶ 非常感谢 Wenfang Tang 提供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

• Cheng Li 发现,“中国的企业家不均匀分布在东南沿海”(Li, 2008, 第8页),这不仅反映了南方政府的相对开放以促进、支持私营商业,而且反映了沿海居民(和外来移民)企业家才能的差异。支持性地方政府的增加部分由于改革初期中央通过建立经济特区(SEZ)放松长期管制的意愿。2007年的数据显示,62.5%的私营企业(员工数量大于或等于8人)和42.2%的个体企业集中在10个东部省份(《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2008)》,第260—261页)。排名前列的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拥有接近1/3(30.8%)的个体企业(同上,第261页)。

• 关于改革的讨论也认可沿海地区的商业/企业家才能更高。根据前总理赵紫阳的回忆录:“本来沿海地区特区是可以多搞一点儿,如上海、江浙等地,特区是可以搞一些的。但陈云特别强调江浙地区,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区。陈云说那里是投机分子活动有名的地方,集中的地方,他们搞投机熟门熟路,一遇时机就会纷纷出笼”(赵紫阳,2009,第102页)。

• 在改革扩展到经济特区以外很久之后,中国研究者承认,来自中国中西部政府的阻挠和不充足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一直以来的障碍。2008年4月,副总理王岐山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并发表讲话,“鼓励中国中部地区领导人进一步解放思想并推进改革”。王强调“转变思想”的重要性,并且指示当地领导“减少对微观经济经营者的干预”。商务部长陈德铭允诺“在中部地区建立商务人才培养基地以培养类似东部的商业人才”,突出了经济文化中的地区差异(Gong, 2008)。

• 2007年的田野调查强调了对于国内和国际市场力量持续不断的突破做出调整的区域差异。西安和宝鸡(陕西省)的企业经常就其有限的销售能力发表看法。有服装企业称,其市场地位受沿海企业的竞争影响而下滑,因为,相比之下,沿海企业对时尚趋势的感知有6个月的优势。西安一家国有纺织企业的经理不同意以染色的产品替代一般的布料以增加盈利。他表示:南方企业这样做,但是笔者不——这似乎将中国企业家分成两类:南方沿海喜欢冒险的企业家和其他地区相对保守的企业家。

• “那些在汽车配件制造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工厂经理们,他们内陆的工厂只能生产‘质量’较低的产品……他们称那些试图提高质量标准的努力在内陆工厂遭遇大范围的文化障碍,即使他们定期让相同省份的工人使用沿海工厂更高级的设备”(Brandt *et al.*, 2008, 第624页)。

六、结 论

本文认为,人力资源是解释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增长起源

的关键因素,尤其是1949年之前几十年甚至几世纪中知识、技能、习俗和商业实践的积累。

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文化特征的深远影响。诺贝尔奖的一系列获奖者已经促使这项沉闷科学的实践者不再像以往一样只关注个人决策,而开始考虑文化特征的经济结果。F. A. Hayek将“传统”和“制度”定义为“在连续几代人传承的经验的结果……没有被任何人预先设计的累计增长的产物”(Hayek, 1960, 第27页)。Douglass North强调集体学习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个体生命或社会中一代人的拓展……”(North, 1996, 第359页)。Leonid Hurwicz详细说明了North的观点,即“社会的或其他方面的特征在初始阶段很小的区别可能导致制度发展的完全不同”,并主张建立“普遍的制度”而非“特定的制度”的模型(Hurwicz, 1995, 第126、134页)。在亚洲继承类似观点的学者中,Kazushi Ohkawa和Henry Rosovsky将日本的长期发展与“吸收借鉴技术的能力”的持续提高相联系,他们认为这与20世纪明治时期以大财阀身份出现商业先驱者有关(Ohkawa and Rosovsky, 1975, 第202、219页)。

对中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析,除了强调历史根源,也不应低估新中国时期发展的人力资源的重要贡献,这表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公共卫生的改善、教育参与的扩大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此外,笔者强调,“大跃进”时期地方政府引入首创性的政策已经演变成企业型公共部门在部分地方政府独特并有效(尽管经常很浪费)的方式。最后,旨在去除中国传统的小规模农业资本的公社体制,却出乎意料地提高了中国农民的企业家创业天性,这也点燃了对于适度但略显踟蹰的农村新方案的剧烈反应,而这些标志着中国改革时代的开始(Rawski, 2010, 第342页)。

近来,尽管中国人力资源储备在规模和影响上都有很大提升,笔者的调查仍多次发现中国经济目前的迅速增长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积累的人力资本有关。

• 在政府20年彻底而坚决地贬低企业家才能和对利润的追求之后,“当中国不再禁止这些……马上出现了相应的反应。商店、餐馆和许多其他服务性企业在各地出现……(因为)中国人……没有忘记怎样进行贸易或经营小商业”(Perkins, 1995, 第231页)。

• 尽管由于移民和迫害造成管理人才的短缺,改革前的学校也没有开设商业管理方面的课程,但是管理技巧的缺失并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公社管理或改革开始阶段农村、城市企业经营的主要障碍。中国在农村经营能力方面的深厚储备,反映出被Tim Wright称为中国历史上“小规模企业家充裕”的重要性(Wright, 1984, 第325页)。

• 即使面临长时间教育回报为负、学校录取标准不再基于能力、大量学校关闭以及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等现实，但是，中国的学子和他们的家庭依然持续不断地追求更高的教育。

• 中国改革最初十年最伟大的成就是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实现了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这段时间，虽然政府、法律体系或组织良好的金融系统的支持非常有限，但私人商业仍迅速发展，这进一步说明1949年之前的非正式制度对理解中国近年来高速增长的重要性。

• 近来的商业方法体现了这些与历史的联系。2009年《经济学家》的一篇报告自负地将中国描述为这样一个社会，即“认为即使在最简单的交易中，有签名和印章的收据也是必要的”。但是，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保护客户以防欺诈和确保客户努力赚得的资金能够完好无损地安全到达距离很远的省份或大陆的接收者手里，这是由几代商人发展的体系的现代表现。在缺少官方保护产权的体制和缺乏发展完善的商业法体系的情况下，这些技术确保最初的乡镇企业和现在的私人企业能够为就业和出口作出主要的贡献。

比较研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民众不同寻常的经济能力。中国移民的商业成就不仅在东南亚超过当地人，在美国也是如此，而美国由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拥有的企业“比白人拥有的企业平均产出更高”（Fairlie and Robb, 2008, 第172页）。即使在前苏联或相关国家，潜在的企业家也面临比共产主义中国发展更完善的市场制度并可以从中受益，但比较数据显示，与中国相比，每千人拥有企业的数量在其他所有国家都几乎更少，即使没有进行对中国农村企业数量严重低估的调整，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计划经济被认为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是对前苏联及其同盟国缺乏企业家才能的标准解释，但是，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仍旧存在而且表现出很高的水平——这反映了在共产主义统治60年之后，传统行为模式仍然存在。

近来的事件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的特别。在意大利的普拉托，“中国工人，最初是少量移民，之后是数以万计……将这个纺织中心变成了低档服装制造中心——增长了大量持续的不满并导致了最近的镇压”。一个地方实业家认为，“中国人非常聪明，他们和其他移民不同”。有人称，“使一些意大利人最难以接受的大概是中国人意大利人自己的游戏中击败了他们——税收规避和以更加精明的方式驾驭意大利出名的复杂官僚体系——创造出一个主要做地下生意的、更加繁荣的部门，并发展得比普拉托本地商业更好”（Donadio, 2010）。

维基百科“团购”的条目反映了类似的问题，“不考虑严谨性，可以翻译

成团队购买或集体购买(也被认为是商店结伙)”。这个条目指代源于新中国近来发展的销售策略。一些人——有时是朋友,但很可能是通过网络联络的陌生人——同时与某一特定产品的卖家联络,从而作为一个群体与卖家讨价还价以得到折扣”(维基百科,日期不详)。

为什么这项基于互联网的消费者才能在中国得以发展? Maurice Freedman 对在东南亚的中国移民的经济成就所做的评论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观点:“‘中国人在经济上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以前并且一直)是他们对富足的追求,他们知道如何处理财富并且处理……与财富的关系”(Freedman, 1979, 第26页)。

参考文献

- [1] “2001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报告”,见 <http://www.8bio.com/sylw/jjxlw/200503/697.html>.
- [2] Anderlini, J., and M. Dickie, “China: A Future on Track”, *Financial Times*, 23 September 2010.
- [3] Arkush, R., “If Man Works Hard the Land Will Not Be Lazy: Entrepreneurial Values in North Chinese Peasant Proverbs”, *Modern China*, 1984, 10 (4), 461—479.
- [4] Baten, J., D. Ma, S. Morgan, and Q. Wang, “Evolution of Living Standards and Human Capital in China in the 18—20th Centuri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0, 47(3), 347—359.
- [5] Benjamin, D., L. Brandt, and J. Giles,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Rural China: Does Higher Inequality Impede Growth?” Discussion Paper, Bonn: 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 2006.
- [6] 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关于1929—1933年间中国168个县的16786个农场和22个省38256户农家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 [7] Brandt, L., C. Hsieh, and X. Zhu,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n Brandt, L., and T.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83—728.
- [8] Brandt, L., and T. Rawski,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Brandt, L., and T.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6.
- [9] Brandt, L., T. Rawski, and J. Sutton,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Brandt, L., and T.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69—632.
- [10] Brandt, L., and E. Thun, “The Fight for the Middle: Upgrading, 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orking Paper tecipa-395, University of Toront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09.
- [11] Brokaw, C., and K. Chow,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12] Buck, J. , “Chinese Farm Economy: A Study of 2866 Farms in Seventeen Localities and Seven Provinces in China”, Ph D. Thesis, Cornell University, 1933,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0.
- [13] Burgess, J. , *The Guilds of Pek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8.
- [14] Byrd, W. , and Q. Lin,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5] Cai, F. , A. Park, and Y. Zhao,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in the Reform Era”, in Brandt, L. , and T.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7—214.
- [16] Ch'üan, H. , and R. Kraus. *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7] Chan, A. , R. Madsen, and J.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18] Cohen, M. *Kinship, Contract, Community, and Stat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hina*.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9] Cushman, J. *Fields from the Sea: Chinese Junk Trade with Siam during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 [20] Ding, K. , “The Role of the Specialized Markets in Upgrading Industrial Clusters in China”, in Kuchiki, A. , and M. Tsuji (eds.) , *Upgrading Industrial Clusters in Emerging Economies*.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70—289.
- [21] Ding, Q. , and N. Yang, “Private Investment Encouraged”, *China Daily U. S. edition*, 14—16 May 2010.
- [22] Donadio, R. , “Chinese Remake the ‘Made in Italy’ Fashion Label”, *New York Times*, 13 September 2010.
- [23] Dyke, N. , *Persistent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etermining the Causes and Closing the Gaps*. Queenstown, MD: Aspen Institute, 1996.
- [24] Easterlin, R. , “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1, 41 (1), 1—19.
- [25] Economist, “Logistics in China: Return to Sender”, *Economist*, 2 May 2009, 65.
- [26] Estrin, S. , and T. Mickiewicz, “Entrepreneurship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Generational Change”, Discussion Paper, Bonn: 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 2010.
- [27] Fairlie, R. , and A. Robb. *Race and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Black-, Asian-, and White-Owned Busin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 The MIT Press, 2008.
- [28] Felipe, J. *et al.* , “Why Has China Succeeded—and Why It Will Continue to Do So”, Working Paper, New York: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Bard College, 2010.
- [29] Fok, K. , “Lineage Ties and Business Partnership: A Hong Kong Commercial Network”, in Sugiyama, S. , and L. Grove (eds.) *Commercial Networks in Modern Asi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1, 159—170.

- [30] Furuta, K., "Inchon Trade: Japanese and Chinese Merchants and the Shanghai Network", in Sugiyama, S., and L. Grove(eds.) *Commercial Networks in Modern Asi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1, 71—95.
- [31] Gilboy, G.,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2004, 83(4), 33—49.
- [32] Gong, Z., "Central China Urged to up Ante", *China Daily*, 28 April 2008, 2.
- [33] Growiec, K., and J. Growiec, "Trusting Only Whom You Know, Knowing Only Whom You Trust: The Joint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and Trust on Individual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Well-Being in CEE Countries", <http://mpr.ub.uni-muenchen.de/23350/>, 2010.
- [34] Harbison, F., *Human Resources as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35] Hayek, F.,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 [36]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
- [37] Hoare, J., "The Chinese in the Japanese Treaty Ports, 1858—1899: The Unknown Majorit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Studies*, 1977, 2, part. 1, 18—33.
- [38] 侯风云,《中国人力资本形成及现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 [39] Hurwicz, L., "Social Absorption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Koo, B., and D. Perkins (eds.), *Social Capability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Houndmills 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95, 123—141.
- [40] 姜旭朝、丁昌锋,“民间金融理论分析:范畴、比较与制度变迁”,《金融研究》,2004年第8期,第100—111页。
- [41] Jing, S., and L. Luo, *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42] Johnson, L., "Shanghai: An Emerging Jiangnan Port, 1683—1840", in Johnson, L.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151—181.
- [43] Kahn, J., "Rioting in China over Label on College Diplomas", *New York Times*, 22 June 2006.
- [44] Kimura, K., "Japa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Prewar Korea: The Case of the Enterprises of Kamaya Aisuke", in Sugiyama, S., and L. Grove(eds.) *Commercial Networks in Modern Asi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1, 39—54.
- [45] Kuchiki, A., and M. Tsuji. *From Agglomeration to Innovation: Upgrading Industrial Clusters in Emerging Economies*. Basingstoke, UK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46] Lele, U., *The Design of Rural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Af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 [47] Leon, L., "Understanding the Potential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ies for Digital Business Ecosystems in Europe", <http://www.digital-ecosystems.org/events/2007.01/macroeconomic-impact.pdf>, 2007.
- [48] Li, C., "China's Political Trajectory: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Inner-Party Democrac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The Rise of China", Mount Holyoke College, 2008.
- [49] Li, L.,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0] Lin, J.,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8, 36 (supplement), 199—234.
- [51] Lin, J.,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1), 34—51.
- [52] Liu, T., and K.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53] Lolle, H., and L. Torpe, "Identifying Social Trust in Cross-Country Analysis: Do We Really Measure the Same?" http://docs.google.com/viewer?a=v&q=cache:DWCNaSOBqrUJ;www.espanet2010.net/en/272.file/p_Lolle-Torpe_Identifying%2520social%2520trust.pdf+lolle+and+torpe&hl=en&gl=us&pid=bl&srcid=ADGEESj5JG8_TmQoGRllEROLX3GunsWUqnGNCGwmDZ9Y_OO2cUqv4Lv_R7fVlV_1TkNzVj6SaTVfZLDpqqtQp728fn2egN1UWq-tukoNBcOee5KsXZkuwmOvB0ErfB0Jm8q28eSNeb&sig=AHIEtbRUyhSkuiQQsfyDeScale7_X46quw, 2010.
- [54] Long, 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and transac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Asian Historical Economics Confer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2010.
- [55] Lyons, T., and V. Ne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China: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ao Era*.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1994.
- [56] Mantzavinos, C., D. North, and S. Shariq, "Learning,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4, 2(1), 75—84.
- [57] Marks, R.,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58] Mead, R., "An Examin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s: The Importance of Private Plo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0, 11(1), 54—78.
- [59] Moll-Murata, C., "Chinese Guild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008, 53 (Supplement), 213—247.
- [60] Morse, H., *The Gilds of China*. 2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2.
- [61] Muramatsu, Y., "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66, 29(3), 566—599.
- [62] Myers, R., *The Chinese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80.
- [63] Naughton, B., *The China Circle: 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 [64] Ng, C.,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65] Nolan, P., and F. Dong, *Market Forces in China: Competition and Small Business—the Wenzhou Debate*.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1989.
- [66] North, 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3), 359—368.
- [67] Ohkawa, K., and H. Rosovsky,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Trend Acceler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68] Perkins, D., "The Transition from Central Planning: East Asia's Experience", in Koo, B., and D. Perkins (eds.), *Social Capability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Houndmills 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95, 221—241.
- [69] Perkins, D. *et al.*,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70] Perkins, D., and T. Rawski, "Forecas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 2025", in Brandt, L., and T.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29—886.
- [71] Putterman, L.,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Collective and Reform Eras in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2] Ravallion, M., and S. Chen,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2 (1), 1—42.
- [73] Rawski, E.,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74] Rawski, E.,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 [75] Rawski, T.,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76] Rawski, T., "Is China's Development Success Transferable?" in Wu, H., and Y. Yao (ed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320—348.
- [77] Rawski, T., "Social Capabilities and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in Tang, W., and B. Holzner (eds.),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 K. Yang and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Diffusion*.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89—103.
- [78] Rawski, T., and R. Mead, "On the Trail of China's Phantom Farmers", *World Development*, 1998, 26 (5), 767—781.
- [79] Rowe, W., "Ming-Qing Guilds", *Ming Qing yanjiu*, 1992, 1, 47—60.
- [80] Rozman, G.,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81] Schott, P., "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 *Economic Policy*, 2008, 23(1), 5—49.
- [82] Sheng, A., "Understanding Global Supply Chain", *China Daily U. S. edition*, 12 July 2010.
- [83] Shiue, C., and W. Keller, "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4), 1189—216.
- [84] Skinner, G.,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 [85] Skinner, G.,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64.
- [86] Verdery, K., "Theorizing Socialism: A Prologue to the 'Transi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1, 18(3), 419—439.
- [87] Viraphol, S., *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e Trade, 1652—18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88] 王业键,《清代经济史论文集》,3卷。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
- [89] Wang, Y.,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zi Delta, 1638—1935", in Rawski, T., and L. Li (eds.),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35—68.
- [90] 维基百科,“团购”,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Tuangou>。
- [91] Wright, T., *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1895—1937*.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92] 吴承明,《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93] 杨国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 [94] Zelin, M.,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Qing Period: Some Thoughts on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Opium War", in Lieberthal, K. et al. (eds.),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Armonk: M. E. Sharpe, 1991, 31—67.
- [95] 张德义、郝毅生等,《中国历代土地契证》。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 [96] Zhao, Z., P. Bao, R. Chiang, A. Ignatius, and R. MacFarquhar,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 [97]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历年。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
- [98]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
- [99] 《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100] 《中国统计摘要》,历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101] 中国网,“2008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见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09myjilps/2009-09/25/content_18603550_4.htm,2009年。
- [102] 中国网,“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基本情况”,见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09myjilps/2009-09/27/content_18613708.htm,2009年。
- [103] 中国网,“私营企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见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09myjilps/2009-09/27/content_18613563.htm,2009年。
- [104]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历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Human Resources and China's Long Economic Boom

THOMAS G. RAWSKI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Abstract An unusually rich compl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accumulated prior to 1949 ha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powering China's continuing economic boom. The legacy of human capital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China's post-1978 boom, which saw explosive growth in impoverished rural communities with little access to the external support that is widely seen as essential in alleviating absolute poverty. After surveying the historic and con-

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the paper uses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focusing on the fortune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business form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long with information about region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to emphasize the unusual depth of human capability in China, particularly in its coastal areas.

JEL Classification J24, N15, O15